

黄裳



散文选集

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黄 裳散文选集

陈惠芬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黄裳散文选集/陈惠芬编.—3 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ISBN 978—7—5306—5370—8

I.黄... II.陈...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344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0.00 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当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陈惠芬

黄裳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自40年代踏上文坛以来，他一直在散文领域里勤耕不辍。同时，他又是著名的版本收藏家和外文翻译家、剧评家，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并曾任过翻译、报社的新闻记者和编辑等多种职务。这些不同经历和身份给他的散文创作注入了种种不同的、然而十分鲜明的印记和色彩。40年代末，踏入文坛未久的黄裳曾以他清丽委婉、活泼俏皮的《锦帆集》、《关于美国兵》和《旧戏新谈》等令人们的眼睛为之一亮；而今，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不懈的探索和努力，黄裳的散文创作则以其数量的众多、路程的漫

长、风格的鲜明、内涵的精深广博、浓厚的历史感和书卷气以及别具一格的文体、知性与理趣结合的双重内美而卓立于当代散文之林，在文坛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说，黄裳是我国当代散文创作中最具个性和特色的作家之一。

黄裳的散文创作起始于他的学生时代，其时他正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读书。作为一名工科大学生，他却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在课程之余，他也学习写作和投稿。据作者自己回忆：投稿的“对象是‘孤岛’上《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习作是小小的散文和‘掌篇小说’，也就是目前流行的‘微型小说’那样的东西。创作的动机是模仿，我想这和小孩子的喜欢学大人说话行事很相近”——不难看到，黄裳的创作发轫和他从小爱好文学，对文学书籍耳熟能详密切有关。

黄裳出身于一个知识家庭，父亲是学采矿的。黄裳是由他的大伯父开蒙的。伯父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用的课本是上海出版的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识得若干字后就开始读“四书”，最早读的便是朱熹编的孔孟的教条、语录。然而黄裳爱

读的却是《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聊斋志异》一类的书，但除了《聊斋》之外，都一律被父亲列为“禁书”。黄裳“自觉自愿”读的第一本书是《红楼梦》。《聊斋志异》读得较晚，却给予黄裳最大的助益，作者回忆说：“我觉得这是第一部使我获得阅读古文本领的最好的课本……古文的语法、句法，差不多都是从《聊斋》里猜出来的，而且以后读更古些的书困难也不多”；此外，黄裳还喜欢杜甫、李商隐等人的诗篇。可以想见，童年时代的这些阅读不仅培养了黄裳古文的底子，而且激发了他艺术的想象力和思考力。黄裳还特别欣赏在南开中学时，英文老师实行的一种“直接法”的教授，这种教学中，学生不必死死记住一条条文法，只要直接接触作品从而从中“猜”出语法的规律来。这种习惯的训练和养成，从“坏”的一面讲，或许缺乏系统、扎实的基础训练，好处却是极宜他随处吸取，碰到什么就能读什么，涉猎极为广泛而方便，尤其在日后动乱的生活里，这种自我学习、修养的本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他思路开阔、知识广博的一面。

自中学时代起，黄裳开始接触和阅读新文学

作品。黄裳的中学时代是在天津度过，就学的南开中学的附近开着三家书店，供应最新出版的各種新文学书籍。家里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多被他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的文集是每种必买，并收有各种文学杂志。买来的书不一定本本看过，而喜欢的就不止于通读，而是反复地阅读，如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和《且介亭杂文》就不知读过多少遍。作者自认他的散文创作受鲁迅的影响最多，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即是始于此。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黄裳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然而入学以后，他却依然对文学表现得饶有兴趣。于此同时，黄裳对新文学作品也倍添热情，于买书、读书之外并“升级”搜罗起新文学的“古本”来。而其时他十分佩服和喜欢的散文作者则是何其芳和他的《画梦录》，以为是一种十分新的流派和风格。也正是在这时，黄裳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向报纸的副刊投过散文、小小说，还模仿夏目漱石的《哥儿》写过中篇小说……，不过，黄裳真正较为连续的写作和引起人们的注意还是在他走出上海的大学以后。

1942年冬，黄裳离开上海的母校到内地重庆去续学。同行4人，途中颇不寂寞，旅途的艰辛和世事的动荡也并没有影响年轻人的好兴致，他们一路都不放弃游玩的好机会。然而因为经济的问题，从宝鸡开始却不得不分成两路，黄裳一个人先走，约好把沿途的见闻写下来留给他们看。黄裳去买了一卷长长的书简纸，于是便有了《宝鸡——广元》这一集束的日记式的旅游散文。这些旅行记，加之其它的一些单篇散文如《成都散记》等，作者先后寄给了当时做出版的巴金，由他找地方发表，而《江上杂记》则是为柯灵所约，发表在他所编的《万象》上。这些作品以后并由巴金为他汇集成册，介绍出版，这便是黄裳的第一本集子——1946年中华书局印行的《中华文艺丛刊》之一的《锦帆集》，取的是李商隐“锦帆应是到天涯”的诗意。《锦帆集》记录了作者1942年冬由上海入蜀两年间流浪漂泊沿途的见闻，而这些风光的描述、见闻的记录中又夹缠了作者浓重的感伤气息，这里或许正有着作者所曾十分佩服和喜欢的《画梦录》的影响或影子：那种少年的梦幻和惆怅，然而却更毋宁说是现实的触发和投

影。这并不奇怪，因为虽说本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而纷繁的世事却预先催熟了、催动了少年的单纯和“沧桑”感。在动乱的时代中，一副年轻的身心孤身漂泊，是难免要有感伤的气息的，倍感到世事的缥缈和前途的莫测。然而作者却开始有意识地克服它。不久后，当作者从昆明、桂林、全县辗转至印度、又迁居到靠近缅甸的小镇雷多，尔后又回到昆明，在等待东归的“闲居”中写作《昆明杂记》（收入《锦帆集外》）等文时，虽无疑更多了人生的遭遇和感慨，却有意地淡化感伤的因子，而将笔墨投入到对古昔——南明史事的追寻和怀想中去。然而恰如作者自己所说，表面的“怀古”之下，隐含在底子里的仍然是“伤今”，是借历史的追寻，来寄托现实的感慨，这是作者的“设计”，也是时代的规定和“局限”，在那样一个动荡而沉闷的时代里，人们只能把目光投射到遥远的历史，然而，骨子里依然脱不掉现实的沉重和羁绊。《锦帆集》和这之后的一段写作，对于作者的创作发轫而言或许是出于偶然，如作者所忆，是因为一份先行的“约定”；因为“乡居寂寞得很……同时心里也总想着忘不了的一些人和

事”；然而它却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作者日后散文创作的特色和风格。如作者自己所说，他的散文，从一开始就“包含了颇多的游记分子”，同时又融入对历史、人物的追寻考察，颇多历史文化的意味和气息，而笔锋则常带着感情。

1945年下半年起，黄裳成了报社的工作人员。他曾经作为报社的特派记者驻在重庆和南京，每天忙于采访和写一些通讯稿。其实，黄裳早在这之前，就已经表现了一个新闻记者的才能。1944年，他从学校中被征调为驻华美军的翻译官，在军中生活过一个时期，也即他辗转桂林、印度、缅甸的时候。回国后，他将军中生活的情况写成一组通讯式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周报》上，后来结集成《关于美国兵》。文章发表后，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当时即有人评论道：“几年前在昆明，从上海的《周报》上，读到黄裳先生关于美国兵的文章，生动的文笔，顿时吸引住了我”。南京时期，黄裳继续他对南明史事的兴趣，在繁忙杂乱的新闻工作的同时，另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实地寻访、查阅资料，写下了一束和《昆明杂记》等一脉相承的融记游、考古、怀旧、

伤今于一体的《金陵杂记》，这也是作者解放前最后的一些记游文字。如此的写作兴趣自然和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在南京这样一个“六朝古都，随时随地都会碰到古迹，大有逛古董铺的意味”，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却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历史并不是都是木乃伊那样的事物，与新鲜的人事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访古也不只是雅人的行径。”

报社工作对黄裳散文创作最直接的触发是他的《旧戏新谈》的写作。1946年末，《文汇报》革新版面，新辟副刊《浮世绘》，由黄裳等人主编。《浮世绘》是娱乐性的副刊，主要着重电影戏剧的评论，为不走以捧“角儿”为主要内容的旧式剧评的老路，必顺另辟新径。但一时即要找到新的表现方式，约稿很困难，黄裳就自己动手来写。于是，1946年底到1947年初，黄裳连着在《文汇报》的《浮世绘》上发表以旧戏为谈论对象的《旧戏新谈》，几乎每天一篇，用的是“旧史”的笔名。《旧戏新谈》谈的是旧戏，重点则在新谈，所论常举史事而不离现实，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而谈论旧戏亦绝不隔膜。那时节，黄裳每天沉浸在对

旧戏的新发现中，而读者每天在报上看完了国内国际的新闻，再来读他的《旧戏新谈》，许多面目：戏中的现实中的，都会浮现在眼前。看文章也就等于看戏、看世态、看人情、看所处身的世界，心有灵犀者，难免百感交集！而戏中本来那些看熟了的道貌岸然的老生、打诨帮闲的丑角，似乎也都另有了一番生气。《旧戏新谈》在当时的现实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恰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12卷的序言所评价的：“黄裳以旧戏人物为题……的《旧戏新谈》系列杂文……面对森严的文网，独辟蹊径，显示了杂文的灵活、机智与巧妙……”；同时，《旧戏新谈》对于黄裳自身的创作来说，也显示了他散文创作的新的素质。如果说这之前的《锦帆集》等在面对现实时难免落寞和惆怅的情绪，那么《旧戏新谈》对现实的态度则要犀利得多；更重要的是，文笔更显特色，思想的表达更为活泼、自如和多姿多彩。如果说在此之前黄裳的散文创作还止于“清新流利”，而《旧戏新谈》的写作，则使他成功地走向了文体家的境界。

1949年以后，黄裳曾有过更为宏大的写作计

划，或曰依然不减当年的写作热情——作者自述当年的写作“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样旺盛的精力，写作并不是为了稿费，当时在报上发表文章，包括后来连载的《旧戏新谈》在内，都是没有报酬的，只是觉得一笔在手，不写点什么就觉得时日空过的可惜。”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延续《旧戏新谈》的路子，黄裳另写了《谈水浒戏及其他》、《西厢记与白蛇传》等两本谈戏的小册子，以及其他一些单篇的谈戏文章。此外也写过一些配合当时宣传的文字，几十年后，黄裳不无严峻地忆起，觉得“曾经发过这样的议论，理应引起深刻的愧悔。即使没有人提出来追究责任，自己也不应该心安理得地保持沉默”，如果说这是“曾经写作”的悲哀，那么在那时的环境下，更多的时候还是不能写的痛苦。1956年，作者曾经做过一次“壮游”，从重庆、昆明，一直走到了大理、芒市，前后历时3个月，在报上辟了个《入蜀记》的专栏，已经发表了五六篇报道，原来打算回来后续写游记，但不久一场风暴袭来，续写便不复可能，只留下了一篇《浣花草堂》和几篇未能化为游记的日记。60年代初，黄裳在香港发表了《虞山春》，其

时,他不仅已被剥夺了在祖国内地发表所写游记的权利,就是外出走走也只能到常熟这样的近处,没有了生活和行动的自由,当然也便没有了创作,没有了纪游的文字,黄裳游记散文的写作就这样被无可奈何地中断了。

因为被剥夺了“出门”的权利,他便想关起门来研究几个有兴趣的历史问题,曾开出一张单子,拟定了一系列研究的题目,准备来一番“闭门造车。”其实这也是黄裳一贯的兴趣和调节的方式。1947年底,黄裳当时工作的《文汇报》被封了门,黄裳索居在嘉兴,由南湖烟雨楼茶室里的“杯水”而联想到了几百年前历史上的风波,遂动兴写下了《鸳湖曲笺证》。写作得到了吴晗、郑振铎两位前辈的帮助,文章写成后发表在《文艺复兴》上,这当是黄裳最早发表的说书散文。而他60年代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清初明末遗民的生活与思想的探讨,他们与新朝统治者的微妙关系,以及通过曹寅表现出来的清初文化政策;通过毛晋、许自昌的出版活动表现出来的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消息;钱牧斋、陈眉公等党社集团和山人名士的真相;“扬州八怪”、“西泠八

家”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厉鹗为首的文士踪迹；……这些都是“想了解三百年来文化史的人所必需认真弄懂的”，对黄裳来说并已着手准备的问题。然而不久后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无可阻挡的到来，一番的苦心经营都付之东流，只剩下了一些“零章断简”。

和许多富有影响的老作家一样，黄裳再度拿起笔来自由地抒写是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以后。1978年冬起，黄裳又能出门旅游、握笔写游记了，他在《前门箭楼的燕子》的开首不无感慨和欣喜地写道：“已经二十多年没有上北京了，真有说不出的相思”，表达的也是他对久违的写作生涯的相思和重获自由的欣喜。这种欣喜的感情充分地表现在他最初的写苏州、南京、杭州的几组文字里。最早的写苏州的一组散文取名《苏州的杂感》，这固然表现了作者对散文、游记文的看法，以为“散文和杂文之间并无一条明显的界限”，游记文中也可掺入杂文的因素，同时也真切地表现了作者在长期的沉默、压抑之后感慨良多、欲吐为快的心理状态。近十多年来，除了苏州、南京、杭州等地外，黄裳并以极大的热情，

花费很大的时间精力，走访了很多地方，他入中原、至边关，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写下了《江上日志》、《黄鹤楼》、《汉中书简》、《天下雄关》、《还乡日记》等一系列纪游散文，出版了《花步集》、《山川、历史、人物》、《金陵五记》、《一市秋茶说岳王》、《晚春的行旅》等多部游记散文集，可以说，近十几年是黄裳游记散文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这些作品除了保持他游记散文一贯的颇为鲜明的文化气息和历史追寻的特色之外，并融入了对现实的独特反思，文字蕴藉流畅、理致淡泊悠长，集中地显示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与此同时，黄裳的说书散文也如冲破地壳的岩浆喷薄而出。这些年来，黄裳先后出版了《榆下说书》、《银鱼集》、《翠墨集》、《珠还记幸》等说书散文集，收在这些集子中的说书散文，除了少量旧作之外，绝大部分是这十几年所写，然而却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心血、积累和感受。如前所说，黄裳60年代即有过研究感兴趣的历史问题的计划，并为此做过大量的收集、准备工作，而实际上黄裳对古书的兴趣和涉猎、收集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以后，因为时代的动荡，生活环境一直变